

先秦时期的国礼 与国家外交

——从氏族部落交往
到国家交往

张健 著



文物出版社

“中国古代国礼与国家外交”系列之一

先秦时期的国礼与国家外交

——从氏族部落交往到国家交往

张健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张 丽

责任编辑 贾东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时期的国礼与国家外交：从氏族部落交往到国家交往 / 张健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7

ISBN 978 - 7 - 5010 - 3640 - 0

I. ①先… II. ①张… III. ①外交史—研究—先秦时代 IV. ①D8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8290 号

先秦时期的国礼与国家外交

——从氏族部落交往到国家交往

张健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 //www. wenwu. com](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18. 75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640 - 0 定价: 128. 00 元

绪 言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氏族部落乃至后来形成的国家是完全孤立、与世隔绝地生存和发展的。正是不同的部族、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接触与交往，促进了不同部族、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在促进各自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同时，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从物质文化史的角度看，所有的接触和交往都离不开“物”作为媒介。不可否认的是，国家关系的确立大都首先是从民间接触和交往开始的，最后通过具有鲜明目的性和较强组织性的、往往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方面的官方交往，对民间往来予以认可 and 规定。古代国家之间相互交往中馈赠的礼物——国礼，是历史上由统治集团组织进行的官方交往的重要媒介。

一般认为，国礼是国家之间在外交活动中相互馈赠的礼物。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当然是在国家产生之后才可能有的现象，而国家又是人类社会发展 to 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但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国家的产生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而复杂的过程，并且自古至今，在普遍的规律性的现象之外，又存在着许多特殊的现象。例如，从没有国家到出现国家的萌芽，从孤立的一个国家实体与非国家实体的共存与交往；又如，中国汉代以后分裂、统一局面的多次出现，正是国家进程中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族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这一现象在当今的世界上仍然存在，如 20 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形成的许多新的国家实体等。而在如今的非洲、西亚，一些国家内部部落林立，从它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上，似乎也可以看到我国夏王朝、商王朝乃至西周时期王室与氏族部落、方国或诸侯之间关系的影子。2011 年 7 月 9 日，从非洲第一大国苏丹分裂出来的南苏丹正式建国，与此同时，其内部却有一些部族势力因分权争议，扬言要推翻现政府。当今世界，一些小国在国家生死存亡或政权稳定问题上所采取的外交手腕，与春秋战国

时期小国在大国之间搞依靠强势的外交活动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文明古国，更是礼仪之邦。“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豕，污尊而抔饮，箠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①。发端于原始饮食习俗和对天地鬼神敬畏的早期礼仪，经过后世的丰富完善，逐步形成了规范的礼仪制度。《礼记·曲礼上》释“礼”为：“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荀子·修身篇》更是强调：“故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礼记·礼运》阐述道：“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其官于天也。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婚、丧祭、射御、朝聘。”按《礼记》的说法，作为礼，时势最重要，其次是人伦关系，再次是具体表现，再次是实际意义，最后是配合适当。

“礼”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古人把“礼”当做道德和客观规律的代名词，中国古代典制的制定就强调一定要符合“礼”的原则。悠悠数千年来，“礼”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谓的“礼”，指的是礼仪和礼制，是一种行为规范，正是这种行为规范的普遍存在使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而作为实物的“礼”——礼物，是作为礼仪和礼制的属于观念范畴的“礼”在实际运用中的物化。甲骨文中“礼”的初文，形象地说明是在器具里放两块玉，象征着人向鬼神奉献。“礼物”中的“礼”原本是“敬神”之意，并由此演化为行为规范，具有了仪式和礼节等理念。由于在祭祀、敬神等活动中需要向祖先神灵敬献物品，所以“礼”从一开始就包含了“物”的成分，也就是要以“物”的形式出现。因此，“礼物”是在一定的礼节甚至仪式下的礼品，而“礼品”则纯粹是物质的东西。《礼记·曲礼下》记载：“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之挚匹。童子委挚而退。野外军中无挚，以纓、拾、矢，可也。夫人之挚，橡榛脯枣栗。”与各项礼仪相关的物，往往都有一定的寓意。这正如《礼记·礼器》所言：“大飨其王事与？三牲鱼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笱豆之荐，四时之和气也。内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

^① 《礼记·礼运》。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纆竹箭，与众公财也。其余无常货，各以其国之所有，则致远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盖重礼也。……宾客之用币，义之至也故君子欲观仁义之道，礼其本也。”它论述了进庙堂时鸣奏钟鼓表示祥和，贡献束帛玉璧表示恭敬恩德，进贡的宝龟排在前列表示能预知万事，进贡的金属器排在第二位表示诚意，进贡的丹砂、油漆、蚕丝、棉絮、竹箭表示与民众共有财物。其余的贡献没有一定要求，让各国用国内所有的特产进贡，表示招致远方的贡物。最初的礼物应该是源自部落兼并、冲突中出现的纳贡行为，先是食物、人、牲畜等，后来随着物质文化的丰富和对奇珍异宝的认识，各种珠宝玉石等成为礼物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还有美女、土地等。在古人看来，礼物必须具有一定的内涵，例如：宾客间用币帛相赠，是最有信义的表现；《礼记·郊特牲》还说进贡虎皮豹皮表示顺从威德，进贡币帛和玉璧表示尊重德行。

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春秋以前，礼物与礼仪相结合的各种礼典自在各级贵族中普遍实行（包括聘礼）完全可以证实”^①。《仪礼·觐礼》记载了西周时期古代诸侯国之间派遣使者相互聘问的礼节：在主宾见面的时候，使者要致送“国礼”——玉圭；在使者归国时，主人要举行“还玉”礼，即把对方致送的玉圭再郑重其事地奉还给使者。玉圭是珍贵的玉器，“送圭”与“还圭”不仅是这一时期必要的外交礼节，更体现了不因为礼物冲淡交往的真情实意，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最好写照。在这里，作为实物的“礼”强化了作为观念的“礼”的作用。实际上，作为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礼”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献记载中的描述和限定，作为实物的“礼”——礼物——也绝不限于属于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礼”的规定。

外交是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以国家的名义在国际关系活动中互相赠送的礼物就是国礼，即国家领导人或国家派出的代表在国际交往中互相赠送的礼品。在当代国际关系研究中，国礼的史料价值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因为它们不仅是国际交往中国家或国家领导人之间互赠的具有象征意义的礼品，还在外交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具有肩负着沟通、传达国家或国家领导人之间友好意愿、传递重要政治信息的作用。国礼馈赠是外交礼仪的

① 李无未：《周代朝聘制度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见证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交流的重要实物。由于国礼或因赠礼人特殊的目的和任务，或因赠受双方共同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堪当载入史册的仪式，或因礼品本身所隐藏的重大历史事件信息，或因赠受双方的友好情谊，因此与普通礼品具有显著的不同^①。中国国家博物馆顾问夏燕月研究员在关于国际友谊博物馆新版基本陈列的思考中提出，友博的基本陈列体系应该全面系统地反映自古以来中外友好交流的历史，其中第一部分表现古代至新中国成立的中外友好关系史，第二部分表现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全新的中外友好关系^②。但是，尽管关于中国古代的对外关系和物质文化交流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从国礼与国家外交的角度进行系统研究的，尚未发现。尽管在波澜壮阔的外交大潮中，国家与国家之间在相互交往中互相赠送的礼品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外交关系的实物见证，国礼具有的特殊意义与作用不可忽视。对于国际友谊博物馆来说，夏先生所提出的第一部分至今还是空白。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于沛研究员所言：“在当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不仅存在如何认识、分析历史文献的问题，同时也存在着如何发掘、收集历史文献的问题”^③。他认为，现在谈论“国礼学”为时尚早，但这门学科与其他任何学科一样，总有萌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在研究“国礼”本身的同时，也要看到“国礼”所产生的历史环境和土壤，赋予它具体的社会内容与社会意义。汉唐以来，随着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繁荣，中国古代的对外交往日趋成熟和活跃，而藩属制度和朝贡体系的建立，更是构建了古代中国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框架体系。然而，在先秦时代，从部落大联盟时期开始，到后来出现国家萌芽，演变至发展成很长时期为东亚地区唯一的国家实体，不仅作为实物的礼品赠送大都是在一系列“礼”的规范下进行的，而且具有丰富的内涵，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国家交往。从这个角度上讲，研究先秦时期的国礼与国家外交有着重要的意义。

① 国际友谊博物馆编著：《带你走进博物馆——国际友谊博物馆》，文物出版社，2008年4月。

② 夏燕月：《迎时代潮流 谱友谊新篇——关于国际友谊博物馆新版基本陈列的思考》，国际友谊博物馆编《中国国际友谊》第六卷“专家论坛”，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

③ 于沛：《“国礼学”与作为“史料”的国礼》，国际友谊博物馆编《中国国际友谊》第六卷“专家论坛”，文物出版社，2007年1月。

首先,中国古代物质产品向外输出和异域物品向内传入的路线在先秦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以后各朝代的对外交往没有脱离开这几条线路,只不过在不同时期有繁荣或衰落程度之分。

影响中国古代物质文明成果向外输出和域外物品传入的因素,既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也受制于地理环境。华夏文明的主体起源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中国古代的“国家”实体首先在中原地区形成,但与此同时,其他地域先后形成的文明在经过相对独立的发展后,相继融合于华夏文明,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文明和地理疆域。

由于古代中国以丝绸闻名于世,所以,后世将以中国传统名产为媒介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发展政治、外交特别是经贸往来的几条路线,统称为“丝绸之路”,域外物品的几条传入路线也都是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一是从周穆王西巡到春秋战国时期初步形成的从中国北方通往中亚地区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又称“北方丝绸之路”,对外交往的主体是中原文明和国家实体,其中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发挥了极大的媒介作用。二是从中原商王朝时期就已经初步开辟,至春秋战国时期日渐成熟的从蜀入滇再经过南中出中国至缅甸、印度的陆上国际交通线,由此可到达南亚直至中亚、西亚,其对外交往的主体是古滇国、蜀国,又称为“南方丝绸之路”。三是东南海上“丝绸之路”,由于东南沿海地区与内陆往来受群山制约,从新石器时代末期开始的海上活动,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继续开拓,到秦汉时期形成了通往马来半岛的航线,在经过三国时期的发展和唐宋时期的繁荣,成为最古老的海上航线之一,又称为“香料之路”,其终点经过斯里兰卡可到达非洲。四是东北海上“丝绸之路”,它肇始于西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后封箕子到朝鲜,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可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并传去了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

其次,对后代影响深远的藩属体制萌芽于先秦,朝贡体系及朝贡外交也形成于先秦。

将藩属观念应用于边疆管理的第一个王朝是汉朝,因为“先秦时期,对藩属体制的构筑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一统观念、服事制统治体制、夷夏观等已经形成,但由于当时的中原各地区尚未完成融合一体的过程,华夏各部凝聚为华夏族的进程依然在继续着,天下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二元结构,因

而维护中原地区安定的藩属体制尚缺乏实施的基础。”完善的藩属观念是汉王朝在总结先秦时期夷夏观、天下观、服事制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①。

部落大联盟时期的首领，已经开始以天下为己任，讲求顺乎天意。黄帝时期，“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帝高辛因“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帝尧时，“其仁如天，其知如神”，使“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帝舜时，“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②，都是这种治理天下理念的反映。禹建夏后，分天下为九州，设五服，以王畿为中心，王畿四周五百里为甸服，五百里外为侯服，侯服外五百里为绥服，绥服外五百里为要服，要服外五百里为荒服，构成了一个以王京为中心的空间观念；根据外地物产制为九等贡赋，集九牧之铜铸成九鼎，上刻各地方物^③。九州之内各地区负有进贡的义务^④。如果这是后人追记尚有不可信之处，那么商代建立的“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内外服制度，已经确实存在并明显地具有藩属和“朝贡”的意义了——内服（中原王朝）作为位居天下共主的商王朝直接统治地区，外服通过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进行统治。早期的畿服制度是藩属体制的萌芽，也是朝贡体系的雏形，尽管它还带有一定的原始部落军事联盟色彩。

商代夏后，商王自认为“天帝”。周王则称为“天子”，为天下共主，追求“大一统”，构筑以“王”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和统治体系，以《周礼》作为行为规范，谋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统一。西周时期，将畿服制度进一步细化，出现了“五服”、“六服”和“九服”的概念，详细规定了各服的贡期和进贡物品类别，特别是提出“九州之外，谓之番国”^⑤，说明中原王朝已经试图将畿服制度推行到没有实际控制的区域，朝贡体系初步形成。《礼记·曲礼上》的“宾礼”和“藩臣之礼”，已经涉及了藩属关系，而且给包括蛮夷在内的各诸侯或王规定了尊王、纳质、纳贡、朝见等各种义务。

《礼记·王制》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中国、夷、蛮、戎、狄，

① 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序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

② 《史记·五帝本纪》。

③ 《尚书·禹贡》。

④ 《尚书·大禹谟》。

⑤ 《周礼·秋官·大行人》。

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为追求“大一统”秩序的稳定，早在先秦时期，中原王朝就开始对“四夷”实施统而不治的羁縻统治。为使藩属体制更加牢固，商周时期分封诸侯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其成为中央王朝的“藩屏”，因为统治者认为：“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捍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①。

如果说《竹书纪年》所载：“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还仅仅是历史传说，那么“献”、“奉”、“贡献”等在先秦古文獻里时常出现，说明中国古代的朝贡外交由来久远，至少证明了先秦时期已有朝贡外交。西周时期，不仅边疆民族政权都被纳入到了朝贡体制之中，即“要服者贡”^②，分封的同姓诸侯和异性诸侯也必须纳贡。不同区域贡纳也不同，其中甸服其贡祀物，侯服其贡嫔物，男服贡其器物，采服贡其服物，卫服贡其材物，要服贡其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藩国，世一见，各以其所贵宝为挚”^③。从班固在《汉书》中说“修奉朝贡，各以其职”，始有“朝”与“贡”合并使用，范曄《后汉书》已多次述及“朝贡”，成为中原王朝与藩属国及异域外交关系的物化体现。隋唐时“朝贡”已成为专属名词，朝贡也成为一项重要制度延续至后世。这一以中原帝国为主要核心的等级制网状政治秩序体系，从西周时期初步形成到19世纪末结束，历时20多个世纪，范围涵盖了东亚、东南亚和中亚等广阔地区。

朝贡体系一经形成，就意味着它必然和贸易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朝贡体系所包含的朝贡外交和朝贡贸易，是古代物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特别是朝贡贸易，通过两国官方使节的往返，以礼物答谢的方式进行交换贸易，而每一次官方使节的往返，都伴随有礼物的赠送和物产的交易。朝贡体系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其实质是宗主认同外交，像西周时期规定的繁琐庞杂的《周礼》一样，在朝贡外交或朝贡贸易中，仪式重于一切，政治上的象征意义高于一切。尽管其政治目的远远大于经济目的，不过是为了达到统治者“近无不听，远无不服”^④的统治理想，不可否认的是，有大量异域物品正是伴随着

①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② 《国语·周语上》。

③ 《周礼传》卷五。

④ 《国语·周语上》。

“朝贡”而输入的。而且，朝贡体系是清中期以前中国与世界国际关系的中心内容，与近代以来西方对待他国的殖民和劫掠行为截然相反，只是到了清代中期终于获知自己既不是世界地理的中心也不是文化的中心和唯一文明的时候，才开始为醉心于“朝贡”而养成的傲慢与无知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无论是藩属体制还是朝贡体系，其建立的立足点都是基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的天下共主思想，反映了古代帝王执政观念上的国际主义抑或是自我中心主义。在地理概念上，认为华夏（中原地区）是世界的中心；在文化心态上，认为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明；在政治统治上，确立中外君臣之间的主从关系，努力营造的“四夷宾服，万国来朝”的华夷世界秩序；在表现形式上，要求外夷臣服朝贡，朝贡国行臣服之礼，宗主国对其进行册封和赏赐。不过，由于西周时期的分封制度以及因王室衰微和诸侯之间的纷争，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连年战乱，畿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统治者的理想之中，没有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但在春秋时期诸侯国对盟主的朝聘以及战国时期弱国对强国的朝聘，实际是这种体系的延伸。

第三，先秦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国际关系性质，为以后诸朝代的对外关系奠定了理论、礼仪基础。

国家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至于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②。原始社会的人们以原始人群、血缘公社、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与生活，没有明确的地域区划概念。在我国，部落联盟基础上形成的国家萌芽（如黄帝时期的所谓建国），至迟在夏商时期已经具备了国家的雏形。国家形成之后，有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

^① 《诗经·小雅·北山》。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权力，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的需要，在原始社会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区划分级管理，产生了原始的行政区划，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国家的行政管辖疆域^①。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因此，外交是有了国家之后才有的事情，不同国家之间的交往，形成了国家外交。国礼正是国家之间在交往中馈赠的礼品。

现在“中国”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复杂的演变过程。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与“外”的概念也随着历史阶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因此出现了某一历史阶段属于“外”的民族和地区，在另一个历史阶段中又融入了中华民族或中原王朝之中；而一些曾经属于“中”的民族和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相对于中原王朝又以“外”的面貌而出现。而且，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占统治地位的中原王朝，也包括中原王朝以外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或政权^②。即使在中原王朝内部，国家形态也往往会有不同的变化。例如，西周时期的周王室经历了由集权到丧权的很大变化，到了春秋时期，它没有军事实力，缺乏经济基础，也没有支配和影响诸侯国的人财物权，尽管它在一个时期内仍然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但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已经与过去有性质上的不同；春秋中后时期的晋齐郑等主要诸侯国也从过去政治上从属于周王室变成了独立国家，而楚秦吴越等南方和西部的蛮夷部落成长为新兴的独立主权国家，它们与近代的独立主权国家并无本质上的区别^③。有学者认为，自西周建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华经历了八个多世纪的“国际关系”时期；从春秋时代开始到形成中华大一统的公元前221年，先秦的中国经历了五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先秦时代各国的关系属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外交关系”而不是“国内关系”^④。理论上，没有大一统的政府，就有“国际关系”。关于先秦时期的“国际关系”是有是无，其性质到底如何，是研究国际关系史专家的职责，但笔者赞同上述分析，并认为夏、商王朝虽然已经建立，但其与诸侯和方国之间也仍然具有“国际关系”的性质。夏、商、

① 孟昭华、王涵编著：《中国历代国家机构和行政区划》，中国出版社，2003年3月。

② 张维华主编：《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4月。

③ 叶自成：《中国外交的起源——试论春秋时期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性质》，《国际政治研究》2005年第1期。

④ 潘维：《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关系》，《凤凰周刊》2004年第28期。

西周三代，天子为“共主”，但这个“共主”经常处于“缺位”状态，所谓的“大一统政府”——如果有的话——是极其脆弱的，了胜于无，夏、商王朝与诸侯和方国的关系特别是征伐证明了这一点，诸侯国与方国之间的关系也证明了这一点。从秦汉以降，历经统一、分裂、统一的若干时期，而分裂时，国与国的关系就变成了国际关系。同样，我们把现中国版图以内的独立于中原王朝以外的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区域性政权与外部世界的官方联系，也作为国际关系来看待。基于此，笔者将先秦以及诸侯国之间、分裂时期的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及其礼品赠送作为了本书内容。

此外，还有关于战争与民族融合的问题。战争和兼并是上古史的永恒主题，现在中国的版图正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战争兼并与民族融合的结果，其中先秦时期的作用不可小视。

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战争历时长久，而夏商时期同样历经了长期而残酷的战争与兼并，使黄帝时期所谓的“万国”的数量急剧减少为只有数百个不同规模和地位的诸侯国。西周时期，中央王朝致力于对诸侯国和方国部落的控制，并不断开拓疆土扩大势力范围。到了春秋时期，在我国境内形成了若干势力不等的以诸侯国形式存在的国家实体。战国时期，兼并与融合达到了高潮，直至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大一统国家。在这个过程里，中原以外被称为蛮夷戎狄的部族或方国，不断地被融合进以中原为主体的国家实体中。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历史上至少有四个由分裂到统一的阶段，即：远古到秦汉为第一次，三国到隋唐为第二次，五代至元为第三次，明清为第四次，这基本概括了中华民族形成和中国疆域形成的阶段性特点^①。

历史上，中国对外交往的主流是和平友好的。自从有了藩属观念和建立了朝贡体系以后，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之间互相攻伐，中国历史上就很少有主动出击的掠夺性和占领性的军事进攻，一般是在获得被攻伐者臣服或朝贡的承诺后即班师回朝，例外的是蒙古帝国时期成吉思汗以掠夺财产为目的的军事征服和远征。世界古代历史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战争，大多是野心侵略、宗教冲突、民族世仇及文化对立，而古代中国的对外战争大都是为了清除安全隐患，而且对宗教、对蛮夷戎狄等华夏以外部族、对异域文

^① 李大龙：《汉唐藩属体制研究》（序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5月。

化等都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正是构筑天下统治秩序的“大一统”理念、君权至上的封建体制、文化的强盛以及厚往薄来、友好平等的对外交往原则，才使古代中华文化成为东亚文化的核心，并成为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宗主国。没有先秦时期奠定的对外关系和贸易往来基础，也就不会有周边国家学习中华文明，并仿效建立了类似于中国王朝的封建体制。而在中国的现疆域内，华夏族与所谓的蛮夷戎狄从先秦时期就开始融合，而后世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也能够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流里。

战争也是促进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因素之一。如先进的铸铁技术是通过“汉使亡卒”传播到了西方，大宛国因为“新得秦人”而学会运用穿井技术，造纸术是通过751年恒罗斯（今中亚江布尔）战役中被俘的中国军士传播到了中亚地区^①。当今世界，无论是19世纪发生在中国的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日战争，还是20世纪的一战、二战、中东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乃至21世纪的今天刚结束不久的利比亚战争，战争之前，总是少不了外交官的穿梭往来，战争之后，也少不了战胜国对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瓜分胜利所得。先秦时期的战争与此相比，本质上并无二致，战败国往往会以臣服，或以赠送土地、财物、人员给战胜国。因此，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因外交关系所引发的战争或因战争所引发的外交往来中，失败者向胜利者赠送礼品乃至割让城邑土地，也就成为极为频繁的事，历史文献对此也多有记载。

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对异域不同民族物质、文化的引进，也离不开通过与异域不同民族的接触和交往在文化、经济、政治、军事、宗教以及社会风俗等方面带来的有时是巨大的影响。就像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普通民众看到一件来自异国的物件会异常欣喜一样，远古时期的人们同样会对来自异域的物品感兴趣，而对珍奇异宝以及财富的喜爱既是统治者也是普通民众的固有心态——社会学和心理学都能够对此予以解释，因此，在国家交往中就有了为了政治目的贡献和赠送，有了政治和经济目的的贸易往来和学习借鉴，也会有为了占有目的的索取和掠夺——特别是在人类社会初期，而这实际是古代物质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无论

^① 卢苇：《中外关系史》（前言），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在“礼物”的概念还是赠送方式上，古代都与现在有很大不同。对于整体的中外文化交流史，有学者将其分为肇始期（远古到战国）、发展期（秦汉至南北朝）、高峰期（隋唐）、繁荣期（宋元）、调适与会通期（明清）和复兴期（民国）等六个时期^①，本书是以远古到战国时期为主要内容的。“但即使相信历史是按照规律发展的学者，也不否认具体的史事都是发生在特定的时空之中，都有其当时当地的特点和限制。”^② 因此，我们也应该把先秦时期的国礼与国家外交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看，而不应该要求其与现代的国际关系及在国际关系中的礼物赠送一一对应。

本书在写作上根本离不开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范畴，吸收了大量此类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笔者希望尽力立意于“国家关系”亦即国家外交的时空背景下，着重于“异域”或是一国对另一国具有官方色彩的物品输入，特别是礼物的馈赠。为了体现系统性，本书从原始氏族部落交往开始，以期理出国家交往的源头，进而不显唐突地转入国家交往，包括具有国家实体性质的交往。

① 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4年3月。

② 罗志田：《相异相关的往昔：史学的个性与通性》，《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2期。

目 录

绪言	1
 一 迁徙与碰撞	
——从原始社会的部落交往说起	1
(一) 部族迁徙与早期文化传播	2
(二) 部落大联盟时期的交往礼物	8
1. 联邦制政权的出现	8
2. 向中原汇聚	11
3. 古史传说时期的国礼：西王母献白玉和息慎来朝	16
(三) 游牧民族与土著世界	19
1. 中华文明西来说	19
2. 游牧部族与土著世界的碰撞	21
(四) 中国原始居民与域外的早期文化交流	23
 二 华夏有礼	
——夏代的国家外交萌芽	28
(一) 大禹时期的外交活动	29
1. 征战与巡狩并重的外交策略	29
2. 积极开展与域内外部族的外交关系	33
3. 家天下的建立与钧台之享	34
(二) 夏王朝与部落方国的关系及朝聘制度的初创	37
(三) 九夷来朝及与丁零族会于中国	39
(四) 从妹喜到伊尹送美女珍宝救商汤	41

三 莫敢不享

- 商代征服中的外交开拓 45
- (一) 商王朝与诸侯国的关系及诸侯国外交 46
 - 1. 建立在贡献基础上的商王朝与诸侯国关系 46
 - 2. 商王朝的国策：四方来献及剿杀与征伐 49
 - 3. 姜子牙施礼救文王助周灭商 54
- (二) 商文化对异域文明的接受和文化输出 56
 - 1. 与中亚民族的交往及物品传入 56
 - 2. 古蜀国的开放与对外交往 63

四 礼仪天下

- 西周时期规范外交礼仪的建立及其对外关系 67
- (一) 四邻朝贺与分封诸侯 68
- (二) 中国古代规范外交礼仪的建立 72
 - 1. 周公制礼与“三礼”传世 72
 - 2. 西周时期宾主会见的主要礼仪及礼器 76
 - 3. 与礼仪、礼物有关的官制和规定 80
 - 4. 最早的外交礼仪——聘礼 87
 - 5. 特殊的外交礼仪——朝聘礼 100
- (三) 西周时期的王室与诸侯国的外交与赠礼 106
 - 1. 西周王室与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 106
 - 2. 考古发现的西周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外交赠礼 112
- (四) 西周时期与域外的文化交流 114
 - 1. 箕子与朝鲜古国 114
 - 2. 周穆王西巡礼品馈赠及西周时期与西亚的联系 116

五 春秋霸业

- 争霸外交中的礼品赠送 124
- (一) 周室衰微乱局与郑国借机争霸 126
 - 1. 郑国送土地争取盟国与卫国送礼借兵伐郑 127
 - 2. 郑国假周礼伐宋与送礼谢齐鲁 130
 - 3. 宋庄公贪赂引兵祸与郑国势力的减弱 133